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主编 匡亚明



# 惠施 公孙龙评传

杨俊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003780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 惠施 公孙龙评传

杨俊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11号

惠施公孙龙评传

杨俊光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57千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305-01273-4/B·64

定价:10.60元

#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

F13 / 1P

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sup>①</sup>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sup>①</sup>,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sup>②</sup>,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

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



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

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

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  
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 内 容 简 介

中国先秦“名家”的学术，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哲学中思辨性最强的部分，也是最有趣而又最难懂的部分。惠施、公孙龙即是“名家”的两大著名代表。本书对这两位传主的生平、著作、思想体系、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等方面，在广泛地吸取前人考证、注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历史上直到今天的研究状况和存在问题出发，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和比较公允的评价。书中，对有关历史的事实和文献资料的文字脱、误、衍、倒以及许多长期聚讼不决致使传主思想体系显得十分模糊甚至无从理解的问题，都作了应有的考证、校勘、训释和研究；史论紧密结合，史实、文字的考释与思想的剖析融为一体，是本书最显著的特色。

##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learning of the school of Names of pre-Qin of China would be the most vigorous part with most strong dialectic thought and interesting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Both Hui Shi and Gong Sun Long are the greatest delegates among the school of Names.

This book deals with the lives, writings, system of thought, social effects and historical positions of these two great biographees.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have applied both Marxism and existing Questions as starting point for his detailed research work and expounded a series of new conclusion and fair evaluations simul-taneously. All the errors long time debated, extent, derivations, reserved matters of those extant writings had severely obscured the major thoughts of that two great biographees even caused no way for completely understanding, which have been checked, collated, critical interpreted and researched in this book already.

The method adopted in this book is incorporating history with exposition, facts, words explanation, and merging thought analysis into an organic whole. These all make up sequentially the notable character of this book.

# 序

春秋战国是一个历史过渡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生产关系、阶级结构、政治制度乃至意识形态，无不发生了激烈变动。在变动过程中，死的拖住活的，活的挣脱死的；旧的缠住新的，新的排开旧的。于是各种事物发生了“名实相怨”的情况，或是有名无实，或是有实无名，更多的是名实相绕。这就产生了“正名”的必要性。中国文化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已进入全面的繁荣时期，思维能力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就为讨论“正名”问题提供了可能性。这个时期，在阶级结构发生变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士”阶层。由于“士”阶层来源不一，成分复杂，因而他们提出的思想、主张、方案也就很不一致，于是发生了争鸣。争鸣的立场、观点虽然各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正名”，这是各家各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首先提出“正名”问题的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

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措）手足。”（《论语·子路》）这段话把“正名”的重要性和政治作用说得非常透辟。其后各家都提出了正名问题。到了战国中期终于形成了一股名辩思潮，出现了一批以名辩为专业的“辩士”或“辩者”。就现存资料看，其中可分为三派，即惠施派、公孙龙派和墨家后学派。他们对名学各有贡献也各有缺点，而以墨家后学贡献最大而缺点最少。名家的贡献在于：第一，他们敢于向旧观念挑战，猛力冲击旧观念，同时也为建立新观念提供了科学上和逻辑上的依据；第二，名辩思潮的兴起，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提高了学术争鸣的质量，使语言和争鸣沿着科学和理性的轨道前进；第三，启发了人们的智慧，拓展了人们的思路，提高了人们的思维能力，扫除了蒙昧主义的影响。不足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摆脱或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羁绊。

名辩学派在战国诸子中是较为重视万物、讲究实事求是的学派，且能摆脱伦理道德观念的纠缠，这与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精神相一致，所以名辩学派曾风靡一时，辩者也曾受到各国诸侯的礼敬。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名学便开始跌入低谷，以致中断了两千年之久。这是因为秦汉时期新兴的封建制度已经确立，君主专制的政体已经巩固，儒家的独尊地位已经形成。朝政不容议论，学术不容争鸣。在这种情况下，名辩之学也就无用武之地了。而且名家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也为封建统治者所憎恨，害怕他们利用逻辑的力量揭露其虚伪性和欺骗性。因此，两千年来，名辩之学一直遭到压制而几成绝学。这给后

世研究名学的学者造成了极大困难。名学著作的散佚、错简、脱漏、讹误的情况十分严重，以致不能成读。

明清之际，实学渐兴，继之，考据学又兴起。在这种背景下，名家著作才开始受到一些人的注意。经过他们一番辑佚、整理、校勘、疏释的功夫，方使名家著作大意粗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大开，西方文化随着商品的流入而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严重地冲击着一向被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使它丧失了往日的权威。逮及辛亥革命，随着封建制度的结束和清王朝统治的垮台，种种禁锢一时崩解，被窒息了两千年的思想界顿时活跃起来，再度出现了争鸣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名家著作又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青睐。他们一方面继承考据学的传统，努力恢复名家著作的原貌，同时更着力于其中蕴奥的抉发和义理的推阐，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名家著作毕竟“受伤”太重，要完全恢复其原貌，固非易事，而要阐发其义蕴，评说其功过，更属大难。

杨俊光同志的近著《惠施公孙龙评传》可以说是肩负了继往开来的任务。一方面，总结了前人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又为后人继续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俊光同志的这部著作是他多年研究惠施、公孙龙两名家学的心血结晶，其中包含着许多丰硕成果，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三端：

其一，关于搜集整理考辨资料方面。关于惠施、公孙龙的资料实在太少，他们的生卒年代、籍贯乡里、生平事迹，都是模糊不清的。关于他们的著作流传情况、真伪程度，也是很难把握的。但是，俊光同志不辞辛苦，从浩如烟海的载籍中，爬梳剔抉、阐幽发微，然后综合排比，考较会证，误



者纠之，信者存之，为他的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古籍中曾记有公孙龙骑白马过关一事，关吏根据法令禁止白马过关，于是又歧出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交纳了马税才得过关的；一说他以“马白非马之论”折服了司关小吏而得过关的。有人疑为捏造，有人信以为真。俊光同志考校了各种记载，断然否定了“过关”一事，认为“实则并不可信”，“只是在做小说而已”。又如《公孙龙子》的真伪、存佚问题。《汉书·艺文志》记有“《公孙龙子》十四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至宋时八篇已亡。”关于这个问题共有四种不同意见：(1)《公孙龙子》一书是后人伪作的；(2)《隋书·经籍志》所录的《守白论》即《公孙龙子》；(3)《公孙龙子》只有六篇，并无残缺；(4)现存《公孙龙子》六篇是《公孙龙子》十四篇的残真本。俊光同志从版本流传的过程和思想内容的分析两方面对前三种意见详加驳议，而对后一种意见作了充分的论证，认为今存《公孙龙子》六篇，除《迹府》一篇为公孙龙门人所辑而外，其余五篇“基本可信为公孙龙子本人的作品”。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也提出了异议，认为“八篇之亡，更可上溯到南北朝时期”。并且根据古人著作体例有“内书”、“外书”、“杂篇”之称，对已佚的八篇内容作了推测：“或可假定所佚八篇主要地也就是所谓‘外书’、‘杂篇’之类。”从上举二例看，可知俊光同志对史料的辨析何等严肃认真！

其二，关于文字校勘、训释方面。汉字形体曾发生过几次变革，从战国时代算起，就发生过由大篆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正楷的变革。每变革一次，都给古籍的传抄带来困难，“形近而讹”的现象在在皆是。即使在同一字体流行的时代，也会因书写材料的更新和印刷技术的改进而造